

新衣裳,旧衣裳

文/图 魏人彪

壮丽70年·宁海年轮

1

老百姓的日常生活,衣食住行,“衣”居首位,说明其重要性。

解放前,穷苦百姓上顿不接下顿,哪里还有盈余三时八节置办新衣?衣不蔽体、衣衫褴褛、一衣御寒……,萧瑟贫寒,民生凋敝的境况随处可见,所以也更加凸显了达官显贵、豪门富贾锦衣貂裘加身的显赫和社会的不平等。

或许迫不得已必须得添一件新衣服了,也得优先考虑父亲吧,一来,父亲是一家的顶梁柱,劳苦功高,又是一个家庭的“门面”,当然“新”之无愧;二来也是节俭,父亲穿旧了可以传给大儿子,大儿子穿过几年,补丁叠补

丁再给小儿子或者孙子,物尽其用,尽管到后来,全然没了衣服原本的色样,只要能穿,却依然穿得。那个时候,一个家庭父子母女、兄弟姊妹共用一件衣服、一条裤子出门见客的情形也是见怪不怪的事。

1993年版《宁海县志》记载,1949年初,宁海城关布店仅5家,从业35人(那时根本没有成衣出售的概念,因此也没有成衣制品零售商店),而当时全县总人口达22万多人,供需极度不平衡中的貌似“平衡”状态,其实蕴含着百姓生活的多少无奈、艰难和酸辛啊!



60年代的穿衣时尚

2

新中国成立后,促进生产,发展经济,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记事之前对普通居民衣着状况和相关市场形态,并不十分清楚。我最初关于衣服的印象,是小学课本里雷锋叔叔艰苦朴素的故事,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画面是他正在穿针引线。在少年时代,有时衣服破了,母亲没时间拾掇,自己又不善针线,我就从医院弄一块胶布或一只伤膏贴,将衣服翻过来,把破损处严丝缝地胶贴好,凑合着穿。现在,我常在网络上看到那个时期前后的一些老照片,即便是彩色的照片,衣物大多都是蓝灰色的,这和我记忆中,整整一个七十年的衣物色彩相差无几。

那是绵延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时代,许多生产和生活资料都是凭票供应的,做一件新的衣服得买布,买布得布票。但是,发到每一户的那几尺几寸布票,包括了被罩、床单等所有居家用布,所以根本满足不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衣着需要。除了夏天可以穿短袖衬衫和背心外,一件外套穿三季的应该为数不少。

善于打理的家庭主妇们往往经常会去逛逛布店,碰到合适的或者喜欢的布料就买下一块,这样一两年积下来,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件、一套了,便自家或与亲戚、或同一道地的一两户邻居并起来,一起请个裁缝,做个十天、半个月。做了却不急着穿,锁进衣柜,等到大年三

十的夜晚,才一件一件拿出来,放在各人的枕边,穿新衣过新年,将迎接新春的欢天喜地释放到最大。我家曾经也请过裁缝师傅,应该是在一个暑假,我不用上学,中、晚正餐都是母亲下班回来做的,买的菜当然比平时的要丰富,闲常日子舍不得多买的鱼肉,是不断顿的。早上、下午的点心由我负责,有时是面条,青菜肉丝面、虾皮面,或者是核桃蛋汤,为了不重复,有时就上街买些馒头、包子。闲的时候,在旁看裁缝师傅画、划、剪、裁、缝、挖眼、盘扣,在针与线的翻飞和交织中,一布一衣便是前世今生,化羽重生,心里曾经好生羡慕这份聪慧匠心、受人尊敬的职业。

我的第三个舅舅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,转业在上海一家工厂工作,后来又随单位迁至西安。记得大约在我读高一年级的时侯,他给我寄了一件棉大衣。那是一件部队的军用大衣,国防绿,带绒的大翻领,衣襟对称两只大口袋,庄重大方,厚厚的棉絮,手感温暖而柔软。那时,我个子矮小,大衣披在肩上还会拖到地面。但这样一件军大衣,曾经吸引了多少艳羡的目光啊!即使春回大地,天气已相当暖和,我都不想脱下来。

天寒地冻的冬季,我裹着大衣,妹妹、弟弟冰冷的手也会伸进来取暖。现在,那件军大衣早已不在了,但这样的情景仍在眼前,心头暖暖的感觉,仿佛经了40多年光阴的烘焙,更加温馨馥郁。



90年代挂历女郎的时髦穿着

3

1978年11月,我招工进了宁海茶厂。

厂里给每个职工发了一套工作服。工作服的面料厚实,色样蔚蓝色,和至今还流行全球的牛仔服差不多。说是工作服,其实不完全是像医生的白大褂那样上班时套一套的,在少衣缺衣的年代,工作服是我们的一件“时装”,一件“礼服”。一时间,在城区的中大街、桃源路两条主街上,只要闪过蔚蓝的身影,不用问,那一定是“茶厂人”。

我对工作服倍加喜爱,天天穿着,只在星期天休息时脱下来,洗一洗,一直穿到蔚蓝的颜色褪淡,泛出一块块棉的灰白,穿到纱的经纬纵横暴露。

1979年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我国开始了全面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。1983年,取消棉布统购统销,所有商品敞开供应。

国门逐渐打开,伴着张明敏“洋装虽然穿在身,我心依然是中国心”的歌声,一夜之间,西装盛行。当时在城隍庙、老文化馆一带,率先成为宁海最早的服装零售交易区,商铺相接,人流不绝,若逢三六九集市,或者节前、行婚待嫁,更是购销两旺,甚至还出现过挤塌柜台的抢购潮。我的妹妹也租了一个店铺,最好一天的营业收入居然高达四五百元,而那时,一般职工月工资收入还不足百元!

在老宁海电影院南侧后的小巷里,曾经有一家“上海商店”,十几平方米的小店,专门经营比较时式的女装,虽然是价位偏高,但依旧深得时尚女性们的青睐。

当然,一条崭新的灯芯绒或卡其布裤、一件的确良衬衣,仍然不失为市民大众所喜爱。

记得有一个时期,社会上流行“喇叭裤”。“喇叭裤”是形似喇叭,裤管在小腿肚子的地方开始逐渐放大,到达鞋面的部位,有些最大的“喇叭口”竟达一尺多。走起路来,大裤脚随步履飘动,有些衣袂飘飘的意思。当时的许多主流报纸还开辟专栏,针对“喇叭裤”之类现象开展关于“奇装异服”的大讨论,倾向性的观点还是以批评的居多。但流行的,终究是不会太长久的,也就一年有余,“喇叭裤”被收进衣柜,在街面上消声匿迹了。

几年之后,象征尊享荣耀的精品商厦在工人文化宫旁闪亮开业,不久,在当时略显偏远的人民大道,宁海大厦也缤纷迎客。

妻子一米六余,不胖不瘦,身材不错,好多品牌服装穿在她身上,总是妥妥帖帖的,深得商场导购小姐们的赞赏。她对服装的观赏和看法也独具慧眼,往往看中的款式,不是木兰,就是玛斯菲尔等等,但一看标牌,价位总在数千。对于我们这样的工薪阶层,这仍然是无法承受的,她常常叹息一声,遗憾万分地挂回衣架。那时候,我经常在晚餐后陪着她逛精品商厦和宁海大厦,我总是劝她,你试一试,你试一试。我想,试穿之后,她一定会多出一分遗憾和伤感,但或许也有可能得到另外一种满足和欢喜。不过,毕竟是买不起,作为丈夫,那一份沉重的愧疚,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坎里,直到现在。



80年代最流行的运动装

4

早在1995年7月—1996年7月,我在奉化步云集团营销部当部长。

那时,服装生产企业如雨后春笋,蓬勃发展。宁海在市场上知名度比较高的是童装,有一休童装、小雨点等。但在有着“红帮”传统的奉化,服装企业几乎占据了奉化工业企业的半壁江山,品种齐全,品牌林立。

其时,步云集团正着手“步云西裤”品牌创建。我是集团公司品牌创建7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。当时,在建设整体设计时,我们不但考虑了品牌定位,消费群体的定位,我们甚至关注到一些细节,比如面料的垂性、裤面拉链的柔度、皮带环的数量和分配、消费者年龄区间的时尚性差异,以及小众化、职业化的特色需求和普遍性的习惯接受,西裤色别与上装搭配套数的最大量值,等等。而那个时候,离真正与计划经济体制分道扬镳只有10年!也就是说,在如此短的时间里,服装之于市民的第一需要已经不是单一的御寒和“喇叭裤”之类简单的形象包装,而是在强化舒适度之时,更多文化的、个性的与市场化的设计和理念包含。

这种对于服装的品质要求是基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。

这种对于服装的品质要求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,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。如今,这种品质要求更侧重于服装原料的生态性、安全性了。

进入新世纪前后,人们对服装的认知,又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,比如年轻人的牛仔服,不乏洞洞,有些洞洞竟有碗口大小!

1997年宁波举办第一届国际服装节,至今已历时22年。宁波引领的全球服装产业,将传统的和现代的、地域的和国际的、实用的和文创的完美地融合在一起,迎来了“消费升级,智能制造,模式创新”的时代。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,不要说大型卖场、街头巷尾商铺的服装琳琅满目,只要拉开每一个家庭的一只只衣柜,又何尝不是男女老幼、春夏秋冬、厚薄丝棉、运动休闲、西装正装等一应俱齐呢?

“旧”衣服多了,也占空间。一些已经“退役”但还是七八成新的,妻子会浆洗干净,然后放进政府部门专门设立的回收箱里,尽一点心愿。

尤其是小孩和女人的衣服,简直多得让人张口结舌。我家外孙女小月亮已经8岁了,亲戚朋友们送的、自家买的,大大小小,无以数计。有些衣服只穿了一年,有些甚至连包装盒都没拆封就小了。没法穿的衣服也洗干净了,一年一大包、两大包的,亲家存放在乡下的房子里,连同她的被絮、鞋帽等,竟堆了半间屋子。

女人是世间的天使和精灵,理应拥有令其百变美丽、无上高贵的万千服装。小城里的女性们虽然未必十分讲究,但总归是居家、上班、会客、锻炼和旅游,还有防风、防晒,衣着都会各不相同,应有尽有。住在我家楼上的一位大妈,前一阵子去欧洲12日游,临行前,一次性网购了8件连衣裙和十几块纱巾。后来,在她的微信朋友圈中看到,她们把新时代典型的中国大妈的幸福和快乐、浪漫和风采尽情地抒发在古老的欧洲大陆上了。

当然,除了“衣食住行”这句话以外,还有句话叫“民以食为天”,意思很明确,如果无以为生计,有再多再高档次的服装也是毫无意义的。但“衣”毕竟是列在了“食”前,我想,这可能是中国人心里那份高于生计之上的精神追求吧。